

傅兰雅档案

The John Fryer Papers

主 编 [美] Ferdinand Dagenais(戴吉礼)

副主编 [美] Peter X. Zhou(周欣平)

[美] Jean C. Han(赵亚静)

中文提示 弘 侠

—— 第一卷 ——

Volume On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傅兰雅档案

第一卷

在中国的第一个十年

1861—1871

主 编 [美] Ferdinand Dagenais (戴吉礼)

副主编 [美] Peter X. Zhou (周欣平)

[美] Jean C. Han (赵亚静)

中文提示 弘 侠

THE JOHN FRYER PAPERS

Volume One

The First Decade in China

1861—1871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版权保留。未经允许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译、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像。

Copyright © 2009 by Ferdinand Dagenais and the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兰雅档案 / (美)戴吉礼(Dagenais,F.)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633-9295-7

I. 傅… II. 戴… III. 傅兰雅, J. (1839~1928) —档案
资料 IV. K83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903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06.75 字数: 1708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0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傅兰雅着清官服肖像

Portrait of John Fryer in uniform as an employee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rvice.
Courtesy of Mrs. Roberta Anne Fryer Driver.

It is with a combination of curious feelings that this journal is commenced. There is a mingled hope and fear, gloom and light, anticipations of a bright future, and occasional forebodings of ill. Yet whatever may befall, whether pleasure or pain, prosperity or adversity, it is a joyful fact that nothing can happen unless directed by a Father's hand. Jesus knows all, and safe under his guidance all will be well.

Opening statement in John Fryer's "Diary of Voyage to China."
from March 10th to August 6th, 1861

这次航行是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开始的。我的内心交织着希望与恐惧、忧郁与明朗,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但时时也会感到一丝不安。不论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好是坏,是荣华富贵或是艰苦逆境,我为之欣慰的是,只有依照上帝的旨意方能成功。圣明的主耶稣会保佑我平安顺利。

傅兰雅《去中国的航行日记》开场白
1861年3月10日至8月6日

序

因研究教会大学史的缘故,过去我对傅兰雅(John Fryer)的大名基本还是知道的。但也仅限于知道而已,了解并不太多,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在清末设立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翻译了不少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直到1998年春夏之交,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访问时的一个下午,我有幸随同《傅兰雅档案》的编者戴吉礼(Ferdinand Dagenais)博士前往祭扫傅兰雅的墓地,才真正激发了深入了解傅兰雅生平与行事的浓厚兴趣。

记得那天下午天气晴好,位于奥克兰的傅兰雅墓静静地躺卧在一片普通的山景公墓(Mountain View Cemetery)之中,周围是青青的草、淡淡的花、微微的风,衬托着旧金山湾区特有的湛蓝的天空,是那般地静穆,那样地朴素,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安葬着一位曾经参与构筑了东西方文化早期交流之桥的巨匠,一位曾“传科技之火于华夏的普罗米修斯”。然而,在我们历史记忆的深处,却始终抹不去“傅兰雅”三个字,以及与这个名字相联系的近代中西文化的猛烈碰撞、交融、再生,一段复杂而曲折的历史,一如傅兰雅墓前常年不断的鲜花,不同肤色的祭扫人群。人们前来此处,既是对一个伟大灵魂的拜祭,也是对一段文化苦旅的寻踪……

时光倒流回去150年,正值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洞开之际,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许多特权,其中便包括在中国传教和设教堂、建学校的特权。于是,大批西方传教士联翩东来,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传教士们涌入中国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播基督福音,扩展教会势力,在地球的另一半为上帝寻找更多的信徒,但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几乎所有的教会又都同时从事一些带有世俗性的社会事业,如刊译西书、创办教会学校、开设教会医院、举办慈善事业,等等。不过,对多数传教士而言,后者仅仅是一种副业,传播福音则是其主业。如林乐知、李提摩太、丁韪良、花之安、伟烈亚力等,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变革,长期以“中国通”自居,但其基本身份认同却始终仍是“传教士”,无论他们从事了何种世俗事务,传教仍然是他们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为其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服务的,是围绕传教这一中心展开的。

相比较而言,傅兰雅的确是较为特殊的,是传教运动中的一个异数,是一种十分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傅兰雅于1861年由英国圣公会派遣来华传教,但其究竟是否是传教士却引起种种争论;在中国长达35年的时间内他并不讲经布道,而是穷其精力致力于西学传播;他来自英伦,但晚年却定居美国,应聘执教于柏克莱加州大学,成为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傅氏于1898年将其在中国数十年的藏书悉数捐赠给柏克莱加州大学,由是始有该校东亚图书馆的创立。历经近80年达到不断充实和进步后,该图书馆如今不仅在美国,实已成为全球研究汉学的权威重镇。追本溯源,傅氏作为该馆原创办

人，厥功至伟。总之，他的一生似乎总是特立独行，充满了变数。

身处变局之中的傅兰雅，平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将大量的西方科技知识输入中国，成为近代传播西学的第一人。如他自己所申明：“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浸昌浸炽，以成百世之盛。”诚哉斯言，其心可鉴。

翻译西书是傅兰雅传播西学的主要方法。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翻译馆，傅兰雅认为，该馆的设立“极有希望帮助这个古老的民族走向强盛，使之跨入西方人引以为豪的向文明进军的轨道”。遂于次年接受清政府的邀请，入翻译馆专事译书。在翻译馆任职约28年间，傅兰雅口译的译著达116余种之多，其中93种已刊，23种未刊，占该馆全部译著一半以上。在已刊93种译著中，包括数学9种，物理4种，化学与化工12种，矿冶10种，机械工程9种，医学4种，农学3种，地图测绘5种，军事兵工15种。这些大量的译著，有的是对有关学科的首次系统介绍，有的则为已经翻译介绍过的学科提供了新的和更好的译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除自然科学、技术、西学书籍外，傅氏译著还包括经济学、国际法、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直接促进了当时维新变法思想的产生。如1885年译刊的《佐治刍言》，对康有为的重要著述《大同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896年译刊的《治心免病法》对谭嗣同“仁学”的形成产生过重要作用。

在早期翻译工作中，如何确立正确的译名是翻译的一大难题。傅兰雅把汉语译名的确定和新名的创造作为译书的首要任务，强调“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并身体力行，为统一译名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先后编写了《金石中西名目表》(1883)、《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83)、《汽机中西名目表》(1889)等4种中西名词对照表，以便读者及后译者核查。他与徐寿合译的《化学鉴原》基本确立了化学元素翻译的命名原则，当时所定的名称大部分沿用至今。从最早参与制订译书计划、确立译书原则、确定翻译名称等各方面看，称傅兰雅为近代翻译西书的鼻祖，似不为过。

编写教科书也是傅兰雅传播西学的重要手段之一。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决定成立益智书会，为教会学校编写教科书。傅兰雅被聘请为该书会的董事兼初级教材主编，林乐知则被聘请为高级教材主编。1879年，傅兰雅又被推举为益智书会总编辑，具体主持教科书编写事宜。在傅兰雅的主持下，至1894年，该书会共编译了50余种科学教科书和数十种教学挂图，其中他本人编译了《格致图说》丛书10种。他自编的《格致须知》27种科学入门书，也被该会推荐给教会学校使用。傅兰雅等人编写的新式教科书对晚清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影响，1902年清政府颁行新学制后，各地学校采用的新式教科书中，有相当一部分便是直接采用了傅兰雅和益智书会的出版物。

傅兰雅传播西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尤重科学知识的普及，在近代中国有意识地、系统地从事科普工作，傅兰雅亦堪称第一人。在这方面他主要做了三件开创性的工作：一是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专门性的科普期刊：《格致汇编》；二是参与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科普学校：格致书院；三是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

《格致汇编》创刊于1876年2月9日，其宗旨就是在中国普及科学知识，以对西方科

学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普通民众为主要对象。名义上《格致汇编》是“接续”丁韪良等人在北京出版的《中西见闻录》，但实际上与《中西见闻录》并没有传承关系，无论其编辑方针还是其内容，都有很大的差别。与《中西见闻录》属新闻、科普、文学兼备的综合性杂志不同，《格致汇编》完全侧重于科普知识的介绍，是一份专事科学普及的通俗杂志。

从1876年创刊至1892年停刊，《格致汇编》前后共出版60期，凡西方科学技艺新知，荦荦大端，无所不包。其栏目风格比较固定，每期都有一篇或数篇介绍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译文，其次是数篇短文，然后是“算学奇题”、“互相问答”、“格物杂说”三个专栏。其中编者为学生答疑而设的“互相问答”又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也是《格致汇编》的一大特色。据统计，《格致汇编》各期上刊载的读者通信共达322件，所提问题，有的是读者来信提出的，有的是读者来杂志社当面咨询的，有的是杂志社自问自答的，其范围包括应用科学、自然常识、基础科学等多方面。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的大致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最希望了解的西方科学是什么。李三宝曾对《格致汇编》“互相问答”栏目的提问部分作过分析，他将读者来函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求实际效用者”，问题涉及医药、日用轻工、铁路、开矿、富强之策等；第二类是“出于好奇心或进而探求事物之理者”，此类问题则大多与一般科技知识相关。他的结论为：“19世纪晚期约在光绪初年之际，中国士商已不乏真正对科学本身发生兴趣或已有心得者（约占读者来函38.2%）。但读者中为功利之目的而对科学技术发生兴趣者仍占多数（61.2%）。”这种估计可能是当时的实情，但也折射出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和西方科技类书籍的大量译介，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和兴趣日增，而《格致汇编》一类科普杂志极大地刺激和促进了这一新兴的思想潮流，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思想的萌发时期。

于1876年正式设立的格致书院采取中西合作的办学体制，主要着眼于普及和宣传西方各种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傅兰雅对该校的筹建和发展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尔敏先生认为：“格致书院之经营，先后有三位灵魂人物，即傅兰雅、徐寿、王韬三人，其中尤以傅兰雅为最重要，始终从事其间，致力最勤，用心最专，贡献最大。”（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要略》，香港中文大学1980年版，第90页）格致书院设立之初，仅限于陈列书籍、报刊和科学仪器以供观览，类似于一个科技阅览室。傅兰雅率先提出修改章程，扩大规模，招收学生，使之正式成为一所传授西方科学的新式学校。傅兰雅还倡议并协助王韬举行了“命题课士”的“课艺”活动，通过命题考试来发现和奖励科技人才。傅兰雅为书院制订了详细的西学课程，并亲自讲授。为增强教学效果，他还采用幻灯片演映有关采矿、人体解剖和珍禽异兽等方面的内容，作为教辅手段，效果明显。在傅兰雅等人的努力之下，格致书院开创了一代教育新风，对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产生起到了某种示范作用，功不可没。

格致书室于1885年创办于上海，实际上是傅兰雅一手筹办的一个科技书店，服务于其传播西方科技的需要。该书店经销的图书以科技书籍为主，兼及其他，如地图、各种科学仪器等。除上海总店外，傅兰雅还在天津、汉口、汕头、北京、福州、香港等地设立了分销处，或通过传教士、外国商人等各种渠道代销图书。格致书室还较早地开设了邮购业务，

并言明不收邮资。这样,格致书室的销售网络可以说是四通八达,遍布中国各地,实际成为中国科技类图书的荟萃之地,也是传播西学的“圣地”。

除了翻译西书、传播西学外,傅兰雅在中国期间犹有一项重要建树值得一提,那就是对时新小说(现代小说)的提倡和推广。傅氏鉴于当时遍及中国社会的崇尚八股文、吸食鸦片和妇女缠足等三项弊端实为妨碍进步的重要阻力,复见于小说有移风易俗的宏伟功效,乃于光绪二十年(1895年)在万国公报第77期刊出有奖时新小说启事,以时文、鸦片、缠足为题,广求针砭时弊,提出救治办法的新小说竞赛稿件。傅氏继于次年(1896年)3月在该公报第86期刊登此有奖征文结果共计162篇,并列出获奖名单20人。这批来自各方的稿件大部份至今仍保存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内(按:此批征文手稿原以为全部已佚,却有幸于2007年1月在馆内整理傅兰雅档案资料时找到)。傅氏此一作为可谓开风气之先,对后世影响难以估量。

一般谓中国现代小说始于梁启超,亦即始于1902年创办于日本横滨的《新小说》杂志,以该杂志于1902至1903以连载方式刊出的梁著《新中国未来记》为“新小说”的首部作品。殊不知在此之前,傅兰雅已早梁7年作了提倡。有关傅氏发起组织这次竞赛的情况,首次由台湾大学的黄锦珠在其《甲午之役与晚清小说界》一文中提出(见《中国文学研究》1991年5月号,第3—7页)。后经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韩南教授(Patrick Hanan)核实,在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一书中予以披露,始揭开这一鲜为人知的史实。

中西文化交流实质上是一个文化对流的过程。在近代“西学东渐”的主导性潮流中,也存在“中学西行”的潜流。部分传教士向欧美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甚至超过了“传教”本身,以致出现了“角色倒置”的情形。其中最典型的一位,便是曾长期在香港居住并主持英华书馆、晚年返回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的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理雅各既是一位传教士,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他曾穷毕生的精力,将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精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全部译成英语,介绍给西方,不仅传播了中国文化,而且长期影响着西方学者的汉学研究,牛津大学的中文典籍收藏和汉学研究传统即是始自理雅各的任教。

与理雅各不同,傅兰雅的角色转换完成于他晚年移居美国西海岸的柏克莱,其大半生都是在向中国传播西学,直到晚年才热衷于传播中学,但对和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终身痴迷却与理雅各又极其相似。1896年,傅兰雅经过长期心灵挣扎和犹豫不决之后,终于离开生活了35年之久的中国,定居美国,担任柏克莱加州大学首任东方语言文学讲座教授,1902年出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讲授有关中国的课程,1913年退休,任该系名誉教授。傅兰雅在柏克莱的30多年时间中,开设了大量有关中国文化的课程,撰写了大量讲义和备课笔记。其讲授课程内容包括中国概况、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宗教、政治、文学、艺术、建筑、商业、金融、人物、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琳琅满目,令人难以置信。他重点介绍的中国哲学家是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先秦思想家;三大诗人是李白、杜甫、

苏东坡;三大改革家是王安石、朱元璋、康有为。显然,此一时期之傅兰雅向西方说法,努力传播中国文化的热情,丝毫不逊于他当年在中国大译西书、大办杂志、倾其智慧和精力传播西方科技文化。

傅兰雅的独特性正在于:无论是在西学东渐史还是在中学西进史上,他都是一位大师巨子,是一位文化的传播者、沟通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十分值得花大力气进行深入研究。

中外学者对傅兰雅的研究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其中尤以美国学者贝奈特(Adrian A. Bennett)的研究最为系统和深入。贝氏的著作《傅兰雅:传西方科技于19世纪的中国》(*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依据部分傅兰雅档案和相关文献资料,重点介绍了傅兰雅在中国翻译西书和传播科技的工作,但对其在中国多方面的活动和思想转变历程则研究仍有不足,中文资料疏漏较多。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改变中国:西方顾问在中国》也辟专章对傅兰雅在中国的活动作了生动的介绍,但以叙述为主,文献支撑也有欠缺。大陆学者专门研究傅兰雅的专著虽不多见,但也有少量力作,其中如王扬宗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较为生动全面地介绍了傅兰雅传播西学的事迹。另有两篇未刊的硕士论文对傅兰雅进行了较深入的专题研究,一篇为杨珂的《从“传教士”到文化使者:傅兰雅个案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另一篇为王小莉的《〈格致汇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此外,有许多著作虽非专门研究傅兰雅,但却辟专章对傅兰雅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如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即用整一章的篇幅对傅兰雅的生平及传播西学的工作作了概述。顾长声所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关于傅兰雅的传记较为详尽,但所用资料大多采自贝奈特的书。刘正伟的《督抚与绅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是一本讲江苏教育近代化的书,书中在将南菁书院与格致书院作比较时,论述到有关傅兰雅的事迹。金宰民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批评试论》(复旦大学,2003年)其中有关篇章也涉及到傅兰雅。另外还有一些单篇的学术论文涉及到傅兰雅的科学书籍译书以及创办《格致汇编》、格致书院等活动,如邹振环的《傅兰雅与江南制造局的译书》(《近代史研究》,1986年10期)、孙邦华的《傅兰雅与上海格致书院》(《近代史研究》,1991年6期)、《寓华英人傅兰雅的宗教与科学刍议》(《学术月刊》1993年8期)、邝兆江的《谭嗣同和傅兰雅的一次会见》(《近代史研究》,1994年6期),等等。不一一赘述。

过去,傅兰雅研究之所以多半限于生平介绍而难以深入,主要在于系统资料难以觅见,一般中国学者很难接触到保存在柏克莱的傅档,而国外学者又很难使用相关的中文资料。如今,戴吉礼博士作主编、周欣平博士和赵亚静女士作副主编的《傅兰雅档案》3大册(*The John Fryer Papers*),详尽收录了有关傅兰雅的英文档案,可以说凝聚了主编戴吉礼博士多年来收集傅兰雅资料的心血。据我所知,戴博士并非历史学家,而仅仅是一个对傅兰雅生平行事有浓厚兴趣的普通美国公民。自退休后,他将自己的全副精力用于收集

傅兰雅的资料,在没有任何正式资助的情况下,几乎仅凭一己之力,数易其稿,独自编成。现在《傅兰雅档案》全三册,终于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无疑是傅兰雅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推动更加系统和深入开展傅兰雅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关于柏克莱的傅兰雅档案,这里稍微多说几句。傅兰雅逝世后,他的后人将其手稿、信件和图书资料悉数捐赠给柏克莱加州大学。2000余册中文图书保存在东亚图书馆;手稿、信件及札记等则存放于柏克莱专门保管校史资料和档案的班克洛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名之为“傅兰雅私人档案”(简称“傅档”)。1998年我在柏克莱大学从事短期研究期间,曾有机会前往查阅该档,发现的确十分丰富和珍贵,系研究傅兰雅后半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资料。

该档案共有6大纸箱(Cartons)和单独的一盒(Box 1)。Box 1主要是傅兰雅1861年至1915年的各种私人信件,尤其是同其胞弟George W. Fryer和其他亲戚之间的来往信函。纸箱Carton 1-2主要是傅兰雅在美国期间所撰写的著作、论文的手稿,以及他在柏克莱开设的有关中国学的各种课程的讲义、备课笔记手稿等,可谓琳琅满目。纸箱Carton 3除部分讲义和备课笔记外,主要保存有他在中国时所写的一些旅行日记、游记的手稿,其中像《长城纪游》、《雪谷纪游》诸篇,颇能表达他对中国雄奇山水的热爱及其优美的文笔。尤可注意者,在这部分的若干散件中,不乏颇有价值的珍贵资料。如1871年、1874年他与江南制造局订立的《翻书合约》副本,合约中写明了聘用期限、工薪数额、工作内容等事项。另有清政府颁发给他的各种褒奖状的原件,如南洋大臣刘坤一奏请颁给他三等第一宝星的附片原件等。这证明傅氏对这些来自清政府的褒奖极为重视。又如他为帮助中国留学生来美求学而用中文撰写的《美国加邦太书院图说》,介绍柏克莱加大情况甚为翔实,对当时有志留美的中国学生大有助益。这些资料大多数都被编进了档案集的第一和第三分册中,给检索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最后,在编排体例上,本档案集按“在中国的第一个十年”、“在上海江南制造局”、“柏克莱岁月”3册编排,既完整描述了傅兰雅的跌宕起伏的一生,又突出了其人生经历的重点,可谓非常合理,独具匠心。每一分册中的章节安排也体现了编者的良苦用心。尤其在资料选用上,保持英文资料的原貌,仅用中文加以提要,使研究者能更多地接触到历史资料的原生态,从而保证能更加全面和原汁原味地对傅兰雅本人和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更成为本档案集的一大特色。

是为序。

马敏于武昌桂子山

PREFACE

The purpose of this publication is to make available documents that bear upon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Fryer (1839-1928) in China and in America. This project began in 1987, when the editor Ferdinand Dagenais began exploring the John Fryer papers in the Bancroft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n 1989, Dr. Dagenais proposed that the University'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convene a seminar honoring the 1989 sesquicentennial of Fryer's birth.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Bancroft Library, and of Donald Shively, then Head of the University's East Asian Library, a broad selection of Fryer's translated works, letters, and publications was exhibited in the campus's Doe Library as a complement to the seminar presentations. In addition to stimulating interest in John Fryer's life and work, the exhibit was designed to display the range of materials available in the East Asian Library and the Bancroft Library.

The East Asian Library collection includes copies of John Fryer's Chinese translations, mostly printed, and ten of his Chinese vocabulary wordbooks in manuscript. The Bancroft Library holdings include a small box of miscellaneous letters, copybooks, and other documents, a few photographs, and three large cartons. These cartons contain a variety of manuscripts, the majority related to Fryer's career as the first Agassiz Professor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cluding, in English, published papers, lecture notes, a few letters, and some personal items.

Dr. Dagenais, then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 East Asian Studies, first became aware of the John Fryer translations in the mid-1950s when Dr. Richard G. Irwin (1909-1969), Chinese Cataloger at the East Asian Library, pointed the collection out to him. At the time the collection was kept in glass cases located out of reach, high on the north wall of the Library's reading room in Durant Hall. Upon learning of Dagenais's interest in the transmission of modern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China, Dr. Irwin was kind enough to describe the contents of the collection. He also presented Dagenais with a copy of a paper he was working on, "John Fryer's Legacy of Chinese Writings," which included a précis of Fryer's life and a categorized list of the East Asian Library's holdings

of Fryer's translations. Dr. Dagenais kept Dr. Irwin's invaluable paper for over thirty years, and used it to structure and describe the East Asian Library's contribution to the Doe sesquicentennial exhibit.

In 1928 John Fryer bequeathed his personal library of perhaps two thousand books, his personal papers, and a collection of some five thousand lanternslides to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his will he stated that the "library of Oriental books, works and manuscripts" was "to be carefully used as a separate reference library by the faculty of the Oriental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Some of the books, now in a state of decay, including leather-bound copies of his translations, have been merged into the general collections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the East Asian Library. The lanternslides, which would have provided a valuable and perhaps unequaled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thir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China, cannot be located.

Examination of the John Fryer papers in the Bancroft Library in 1987 was difficult because a detailed inventory was not available, many of the letters and other personal papers were handwritten, and the copybook pages were beginning to disintegrate from age and use. After first compiling an inventory of the letters and papers, Dr. Dagenais began the work of transcribing all documents in the collection pertinent to understanding John Fryer's life and work. Dr. Dagenais hoped that the inventory would prove useful to scholars and that his transcription of Fryer's letters would preserve the documentary record of Fryer's life and achievements. Once available to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the record would provide primary source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the inventory of papers would complement the inventory of translations in Dr. Irwin's paper. Dr. Dagenais also anticipated that the digitally transcribed letters would made available via some form of electronic media, and perhaps eventually be published.

Dr. Dagenais completed a simple inventory of John Fryer's papers in the Bancroft Library, but it could not include papers and letters not at the Bancroft. There were also published items found in hard-to-find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which would contribute to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John Fryer's life and work. Hundreds of pages of letters, papers, publications and other items were transcribed. To increase the usefulness of the inventory, Dr. Dagenais decided to structure it as a *calendar* and to integrate salient parts of the transcriptions. He thereby produced a document that could serve as a tool for

understanding Fryer's achievements in China and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uring the period 1861-1928.

This work necessarily involved a process of discovery and verification. Fryer was meticulous in selecting those letters and copies of letters that he wanted preserved. In several letters, he mentioned keeping a diary, but no diary or journal has been found among the papers he deposited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There should be letters, or copies of letters, to and from John Fryer in other collections in China,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searcher might also expect to find references to Fryer in the diaries and memoirs of others, especially those written by the Chinese with whom he worked at the Jiangnan Arsenal. There should also be references to Fryer in missionary diaries and in the archives of missionary societies that were active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Documentation of his activities should also appear in the archives of the Jiangnan Arsenal, which have yet to be catalogued or made available.

In 2004, Dr. Dagenais discussed the John Fryer papers with Jean Han, then Librarian for the Chinese Collections of the East Asian Library, and Dr. Peter Zhou, the Library's Director. All three agreed that it would be useful to scholarly communities in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f Fryer's papers could be published in China, a country he loved and to which he had made lasting contributions through his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tific thought and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digitized materials already assembled, they decided to edit the documents, grouping them into three volumes; the first volume would contain papers concerning Fryer's first decade in China from 1861 to 1871; the second volume would cover his work in Shanghai, particularly at the Jiangnan Arsenal from 1870 to 1896 and after; and the third volume would focus on John Fryer's life and work in California from 1896 to 1928.

Dr. Dagenais was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 selection of Fryer papers from the transcriptions he had already collected. The papers were assembled and co-edited with Dr. Dagenais as the editor and Dr. Peter Zhou 周欣平 and Jean Han 赵亚静 as associate editors. They worked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through many drafts. To help Chinese readers better understand John Fryer's papers, the editors asked Hongxia 弘侠, an accomplished doctoral stud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t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to provide Chinese translations and annotations to selected passages. Hongxia did a superb job. Professor Ma Min 马敏, a respected scholar of Chinese history with an interest in John Fryer's

career, graciously wrote the Chinese preface.

The editors would like to extend special thanks to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t Berkeley and its successive directors, Joyce Kallgren, David N. Keightley, Thomas B. Gold, Wen-hsin Yeh 叶文心, Liu Xin 刘新, Jeffrey Riegel, and Kevin O'Brien for providing access to the Center's resources. Donald H. Shively, late former Head of the East Asian Library, graciously facilitated access to material in the Library. William Roberts, University Archivist at Berkeley, searched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s' files and the archived papers of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providing a number of important letters concerning Fryer's career at the University.

The editors' thanks are also extended to Professor Patrick Hanan for sharing with us a draft of his paper "The New Novel before the New Novel—John Fryer's Fiction Contest"; and to Dr. Joachim Kurtz for bringing his paper, "The First Chinese Adaptation of Mill's *Logic*: John Fryer and his *Lixue xuzhi* 理學須知 (1898)," to their attention. Dr. David Wright provided useful bibliographic references and much insight through his publications. Li Yadong 李亚东, Wang Yangzong 王扬宗, Han Qi 韩琦, and Sun Banghua 孙邦华 were kind enough to provide reprints of their papers on Fryer. Mrs. Roberta A. Driver (née Fryer) of South Africa, John Fryer's granddaughter, generously shared family photographs, anecdotes, and material on the Institution for the Chinese Blind. The editors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Rosemary Keene at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providing access to archived CMS lett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and staff at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y for providing copies of material from their archives. Finally,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to Xu Xing 徐星 for sharing her work on her prominent ancestors Xu Shou 徐寿 and Xu Jianyin 徐建寅 who worked closely with John Fryer at the Jiannan Arsenal.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identify and acknowledge the source of each item presented in these volumes. In the interest of completeness, the items in the Bancroft Library can be identified as coming from the following cataloged repositories:

BANC MSS C-B John Fryer Papers;

BANC MSS C-F 206 Edmund R. Lyman Papers;

CU-1 Box 25:1 Records of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868-1933; and

CU-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ecords

The editors hope this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and images will encourage scholars to identify and publish additional archival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John Fryer's life and work in China and America, and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and scientific transfer as China began to modernize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Ferdinand Dagenais (戴吉礼)

Peter X. Zhou (周欣平)

Jean C. Han (赵亚静)

Berkeley, California

November 2009

编辑说明

1. 《傅兰雅档案》(*The John Fryer Papers*)收集了从1861年傅兰雅去中国起至1928年他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去世止67年间他所有的重要档案文书,包括私人通信、日记、公文、会议记录、回忆录、论文、杂志、纪念文章等。本书所包括的大部分档案文献根据现存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班克洛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的原始档案誊录。部分档案和照片由傅兰雅的后人提供。全书按档案部分的历史顺序编为3册。各分册和章节标题由编辑制定。所收档案均按出现年代依序编号。

2. 档案文字尽量反映傅氏的原意,包括保留他的拼写习惯和标点符号的使用。即使在文献中发现偶有疏漏错误,亦均以原件为本,不予以改正,力求忠实呈现档案原貌。唯在重要地方为了帮助了解作者原意,编辑在错误的地方标示[sic]或另在脚注里加以说明。

3. 档案中所有人名、地名及机构名称的汉字罗马拼写均保留原始档案中出现的形貌。由编辑所撰文字则遵从汉语拼音系统。原档案中出现的汉字一律依照原文,采用繁体,而编辑所用文字则用简体。

4. 为了帮助阅读及阐明文意,档案备有中文提示,并非全文逐字翻译。读者若需引用傅兰雅档案,应以档案的英文原文为准。

5. 档案中由编辑提供的文献均注明出处和历史背景。档案中由编辑加入的文字则放入括号中。

6. 档案中有不少汉字为傅兰雅本人手写,许多他早期创造的中文科学技术词汇至今仍在沿用,唯有部分字迹已难辨识。对无法辨认的字,一律用方框标示或将原始字迹以照相图像呈现。

7. 为了方便研究,在档案附录中收入了若干非傅兰雅所著、但与他的工作关系密切的文章和研究论文。

8. 每册书末附有本册中英文的条目检索,但仅限于重要历史人物、机构、地名。一般人名和地名则从略。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柏克莱加州大学班克洛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工作人员的莫大协助,为我们提供该馆珍藏的傅氏档案资料。复旦大学历史系